

新时代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逻辑、实践规律与形成路径

谢建邦

摘 要 新质生产力是在新发展格局下,通过科技创新和数据驱动的元素协同实现的生产力实践条件变革,它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引领,以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为目标,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构建“实践条件—实践手段—发展目标”这一生产力理论框架,并从纵向的历史演进逻辑和横向的形成机制双重维度解构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需要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思维协调宏观发展目标与生产力实践过程,通过科技创新引领生产力变革,利用要素协同和产业融合创造有利的发展条件。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 数字经济 高质量发展 产业融合 要素协同

DOI:10.13878/j.cnki.yjxk.20240025.001

一、引 言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期间首次提及“新质生产力”,强调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增强经济发展新动能的关键要素,准确理解其理论内涵和实践规律对回答“如何形成”和“如何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等问题至关重要。在理论层面,新质生产力是将马克思生产力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和中华卓越传统文化相融合的重大理论创新和理论突破,需要关注其在理论上的承续性和实践上的适应性。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演进的结果,既在演进逻辑上具有历史连贯性,又在形成路径上具有时代特征。因此,对新质生产力的研究还需要回到“生产力”本身,从纵向梳理其历史演进逻辑,从横向解构其发展机制,运用唯物史观的科学方法论探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路径。

学界在解读马克思经典著作的过程中,对生产力的概念有多种见解。部分早期的研

作者简介: 谢建邦,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数据要素市场驱动北京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23JJB014);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创新实践一般项目“畅通‘数据之旅’:农业经营主体数字化转型策略可持续性研究”(2022BSCX17)。

究将生产力解释为“人类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进行物质资料生产的能力”^①。这类定义停留在描述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只阐明了生产力的水平反映了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小,但没有解释生产力本质上是什么,以及为何要发展生产力。^②除此之外,这种一直强调人类对自然具有主导地位的观点——以征服自然为荣,以改造自然为刃,视自然资源为战利品——不仅成为人类掩耳盗铃,不断通过掠夺、破坏自然资源以谋求经济社会发展的托词,而且忽略了全面发展人的个性与自由等本源目的。^③还有部分学者尝试从生产力要素的视角拼凑生产力的理论内涵,继而产生了二要素论、三要素论和多要素论之争。例如,将人力要素、物质要素、科学技术和组织管理方式等看作现代核心生产要素。^④其主要依据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形成劳动过程的要素和影响劳动生产力的因素等的论述,例如“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⑤、“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⑥等。然而,无论是决定劳动力的因素还是形成劳动过程的要素,都只是为诸多因素与生产力的内在联系提供洞见,本质上既未将生产力的发展目的涵盖其中,也没能明确劳动者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主动性与能动性。^⑦因此,即便不断添加和丰富反映时代特征的生产力要素,也只能对生产力内涵进行有限的补充,生产力概念仍需要更具一般性和完备性的理论界定。

本文尝试对生产力的理论内涵进行梳理和总结,提炼出更具一般性和完备性的理论分析框架,为新时代新质生产力的概念阐释和形成路向提供理论基础。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考虑生产力在实践过程中所呈现的渐进式、螺旋式发展演变规律,从纵向的历史演进逻辑和横向形成机制双重维度对新质生产力进行解构;第二,关注新质生产力在实践过程中的外部动态性和内部互动性,提供有利于整体与局部、长期与短期均衡发展的对策建议。

二、理论逻辑: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渊源与内涵

(一) 新质生产力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生产力理论的发展大致可划分为探索发展、系统集成和赓续创新三个阶段。

探索发展阶段可追溯至古典政治经济学时代。生产力这一思想和概念在学者们对财富的来源进行探索时即初见端倪。重农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弗朗斯瓦·魁奈(François Quesnay)被认为是最早提出并使用生产力概念的学者。他基于当时的经济发展进程,认

① 编写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页。

② 马昀、卫兴华《用唯物史观科学把握生产力的历史作用》,《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1期。

③ 柯宗瑞《生态生产力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1年第1期。

④ 鲁品越《〈资本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概念的再发现》,《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8页。

⑦ 张朋光《生产力解读的四种范式和三重境界——棱镜中的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研究评析》,《学术论坛》2016年第1期。

为只有农业劳动才是生产的。在他看来,生产力即“土地生产力”。^① 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中分析了劳动生产力,将“劳动”看作国民财富的重要来源。^② 萨伊(Jean-Baptiste Say)创造性地提出了“精神生产力”,认为生产是土地、劳动和资本的结合,并进一步将生产力细化为“资本生产力”和“自然生产力”。^③ 在此基础上,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提出机器是生产力的重要构成要素,认为财富的增长“主要取决于土壤的实际肥力、资本积累和人口以及农业上运用的技术、智巧和工具”^④。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是最早倡导建立并系统地研究“生产力理论”的经济学家。他认为“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⑤,且“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主要并不是像萨伊所相信的那样决定于它所蓄积的财富(也就是交换价值)的多少,而是决定于它的生产力的发展程度”^⑥。因此,李斯特的研究同时重视包括制度、环境、科学技术、教育、自然和人力资源等因素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⑦

在系统集成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回顾了早期西方经济学家们的研究成果,不断完善并提出了完整且科学的生产力理论。马克思经典著作中的生产力包含两层内涵,其一指代生产效率、生产水平,其二指代生产力诸因素。生产力因素形成了生产过程,而生产效率和生产水平则是生产过程的结果和表现。^⑧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即“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⑨。在《资本论》中,“生产力”这一概念贯穿于马克思对资本的产生、流通和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过程。马克思将生产力看作社会的生产力,认为是社会将改造自然作为手段和实现物质财富增长目标的能力。此处,“能力”同时涵盖了生产力实践中的基础条件和约束条件。前一阶段的生产力实践创造了当前阶段的基础条件,并为当前阶段的发展目标提供支持。约束条件则对发展目标形成限制,对当前阶段的生产力实践提出要求。进一步,列宁和斯大林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使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得到具体化和发展。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利益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⑩ 他将生产力的发展看作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并提出技术改造、改造农业劳动组织、发展大工业和利用资本主义的工具等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措施。^⑪ 斯大林的生产力思想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生产力思想,并进一步厘清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逻辑,地理环境、人口等外部因素对生产力的影响。

① [法]弗朗斯瓦·魁奈《租地农场主论 谷物论》,吴斐丹、张草纫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91-102页。

②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7-14页。

③ [法]让·巴蒂斯特·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陈福生、陈振骅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72-75页。

④ [英]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3页。

⑤ [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18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7页。

⑦ 黄亚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生产力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26页。

⑧ 孙治方《什么是生产力以及关于生产力定义问题的几个争论》,《经济研究》,1980年第1期。

⑨ [德]马克思、[德]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多语种珍藏版》,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年,第44页。

⑩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69页。

⑪ 黄亚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生产力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31-32页。

在赓续创新阶段,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相结合,使得生产力理论的发展更具时代性、实用性与现实性。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注重革命对于解放生产力的意义。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邓小平提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重要观点。江泽民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阐明,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质是先进生产力取代落后生产力的历史进程。胡锦涛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并在深入研究我国实际情况后,创新性地提出了“新质生产力”这一新概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

综合以上观点,实践条件、实践手段和发展目标共同组成了生产力的理论架构,即“实践条件—实践手段—发展目标”生产力理论框架,在此框架下探讨新质生产力,会发现其蕴含着丰富的理论内涵。

(二) 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

新质生产力的实践条件包含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和人们之间利益矛盾的协调性两个方面。^①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谈及一切生产的条件包括“进行生产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和“或多或少促进生产的条件”,这为新质生产力的研究提供了切入口和方法论。^② 一方面,新质生产力的实践条件包括物质条件和技术条件。“生产力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后来的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并当作原料来为自己新的生产服务,由于这一简单的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越益发展而越益成为人类的历史。”^③ 因此,新质生产力实践的条件既涵盖了前人实践的结果,同时也描绘了新阶段的起点,具有历史的连贯性和发展的连续性。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了协作、分工、机器生产等是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三种基本历史形式。^④ 如今,数字、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促进了跨产业、跨区域等更大范围的协作,支持更具专业化、细密化的分工模式和智能化的机器制造,使社会生产力得到质的提升。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涵盖了反映社会发展阶段特征的生产力思想和生产关系变化导致的生产条件变化。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提出“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反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

① 孙大飞、张春和《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生产力思想发展研究——基于人的发展的视角》,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第 198 页。

② 柯宗瑞《生态生产力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1 年第 1 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第 686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第 409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第 159 页。

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赋予新质生产力以更丰富的内涵。形成新质生产力既需要考虑发展战略、宏观政策环境和资源配置制度、微观经营机制等方面的差异产生的影响,也要将社会制度差异纳入研究范畴,考虑生产关系是否适应生产力的发展。^②

新质生产力的实践手段是指实现生产力发展目标的工具性目的。生产力是劳动的生产力,即劳动者利用生产资料和其他生产要素推动生产力的发展。^③马克思认为“研究在各个民族的发展过程中各个时期的生产率程度”是评价亚当·斯密所说的“前进或停滞的社会状态”的关键。这暗示了“生产率程度”(即生产效率和生产水平)作为促进生产的途径和手段,是生产力发展的工具性目的。这与可持续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等成就性目的存在区别。“取得发展并不是一种自我生效的绝对目标,而是一种相对较好的、只是取得某种特定生活意义上较为可取的状况。正是没有看到这种相对性,使得许多人把发展变化进程等同于它的目标,这样就把工具性的目的错认为成就性目的。虽然在某些方面,发展本身是追求目的的,但是在更深层面,发展从属于美好生活。”^④据此,可以厘清新质生产力实践的“条件”“手段”与发展的“目标”之间的内在联系:生产力要素形成了新质生产力的实践条件,生产效率、生产水平则作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工具性目的,即“手段”。实际上,实体经济是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载体。^⑤为实现生产力的发展,需通过制度构建、战略部署和政策引导等手段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协调短期条件约束和长期美好愿景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成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手段。物联网(IoT)、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技术渗入各个行业,在全球范围内形成智能制造、智能农业、数字零售和数字物流等新产业形态,为生产力实践带来深刻变革。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目标是为了应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显现出的主要矛盾和实践需要而产生的社会发展观念。在不同时代,社会发展观念围绕物质、人和生态自然发生演变。在工业文明时代,物本主义的传统发展观念主导着生产力实践,人们片面地将发展问题理解为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的增加,这是发展手段代替发展目的、工具理性战胜价值理性的表现。迈克尔·托达罗(Michael Todaro)、丹尼斯·古雷特(Denis Goulet)和贡纳尔·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等尝试对这种将人的主体性、社会公平等边缘化于整个社会发展系统的不正常情况进行纠正,将社会的全面进步纳入对发展问题的考究中,提出社会中心型发展观,认为发展是经济增长与社会变革的统一。在罗马俱乐部提出“增长的极限”后,工业化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生态问题引发了赫尔曼·戴利(Herman Daly)、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和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等学者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他们提出并完善了可持续发展理论。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在《1996 年人类发展报告:经

① 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68 年,第 141-142 页。

②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64-65 页。

③ 马昀、卫兴华《用唯物史观科学把握生产力的历史作用》,《中国社会科学》2013 年第 11 期。

④ [美]德尼·古莱《发展伦理学》,高钰、温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第 43 页。

⑤ 苏玺鉴、孙久文《培育东北全面振兴的新质生产力:内在逻辑、重点方向和实践路径》,《社会科学季刊》,http://kns.cnki.net/kcms/detail/21.1012.C.20231222.1549.040.html。

济增长与人类发展》中指出无工作增长(jobless growth)、无声增长(voiceless growth)、无情增长(ruthless growth)、无根增长(rootless growth) 和无未来增长(futureless growth) 五种不可可持续发展的情况,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的内涵。^①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随着对经济、社会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认识的持续深入,人们更加关注人类自身的发展。发展的焦点逐步从单纯的经济增长转向人的全面发展,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

新质生产力并不是一次性形成的,而是一个持续迭代、重复反馈的过程(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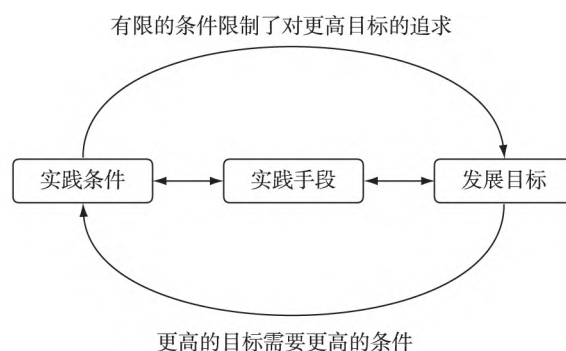


图 1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过程

在生产力实践的过程中,条件、手段和目标既相互促进,又对彼此形成制衡。一方面,生产力的实践条件决定了手段选择和目标决策。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②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又说“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③生产力的实践条件是反映前人实践结果与历史积累的基础条件,同时也是可被创造、可被改造的动态变化的约束条件。若根据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区域的发展方式。具备相对丰富的资源和廉价劳动力但资本严重匮乏的地区,很容易(至少在发展初期)选择外向型、粗放式的发展模式来积累资本。但不可忽视的是,教育投资、科研投入等能够增加社会的创新能力和科技水平,为下一阶段的生产力实践创造了新的基础条件。另一方面,目标的变化反过来又对生产力实践条件提出了不同的要求。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美好生活产生了更加丰富的理解,对生产力实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客观上,经济社会的发展消耗了大量的物质资源,资源约束对创造更多的财富形成阻碍。但在主观上,社会发展观念的演化赋予生产力实践目标以更多维的内涵,譬如更加追求精神上的财富、更注重长期的发展、更关注生态环境保护等。新的目标对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和

^① UHDR Office,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6: Economic Growth and Human Develop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2-4.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第 3 页。

^③ [德]马克思、[德]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第 32 页。

组织创新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过不断调整要素结构改变着生产力实践的约束条件。实际上,马克思运用运动的发展的视角来分析生产力要素,认为生产力要素随时代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内容和标准。只有当主体依据客观规律来优化对客体的改造,他才能更有效地促进自身的发展。而当主体的发展得到提升,他就能更深入地理解客观规律,从而更有效地改变客观世界。^① 这在生产力内部产生了推动其自身发展的矛盾统一体,构成了一个自我循环发展的理论体系。

总体来看,生产力与经济社会的发展互为表里。生产力的发展目标是经济社会这一“车辆”的“前轮”,它把握着“车辆”行进的方向;生产力的实践条件是“后轮”,它驱动“车辆”前进;生产力的实践手段则是“传动轴”,它协调车辆的动力配置。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大国竞争博弈愈演愈烈,逆全球化不断加剧。通过科技创新赋能,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全面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是打破技术、资源和环境约束并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的生产力发展新思路。因此,根据上述在“实践条件—实践手段—发展目标”生产力理论框架下对新质生产力进行的分析,并结合当前所处的时代背景,笔者认为新质生产力是在新发展格局下,通过科技创新和数据驱动的要害协同实现的生产力实践条件变革,它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引领,以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为目标,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下文将从纵向的历史演进逻辑和横向的形成机制双重维度解构新质生产力,揭示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规律(图 2)。

三、实践规律:新质生产力的历史逻辑与形成机制

从历史演变的逻辑来看,新质生产力是传统生产力变革创新的结果。马克思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② 一直以来,我国根据社会主义各个发展阶段所呈现的环境特征和要素禀赋选择并实施了一系列发展战略,因地制宜地布局生产力。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变,我国的发展理念展现出从狭窄的器物视野与发展框架到“可持续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和“新发展理念”等以人民为中心、关注人的全面发展的新型现代化发展理念的嬗变。新质生产力的出现有其历史演进逻辑和时代背景。

(一) 生产力的实践条件、发展布局与思想演变

在生产力理论框架中,实践条件、实践手段与发展目标的主要表现依次对应于生产力的实践条件、发展布局以及发展思想。我国的生产力实践过程大致可划分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初期和进入新时代三个发展阶段(表 1)。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国通过土地改革、民主改革以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迅速扭了解放初期面临的不利局面,为解放生产力、跳出“贫困陷

^① 孙大飞、张春和《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生产力思想发展研究——基于人的发展的视角》,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第 4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第 210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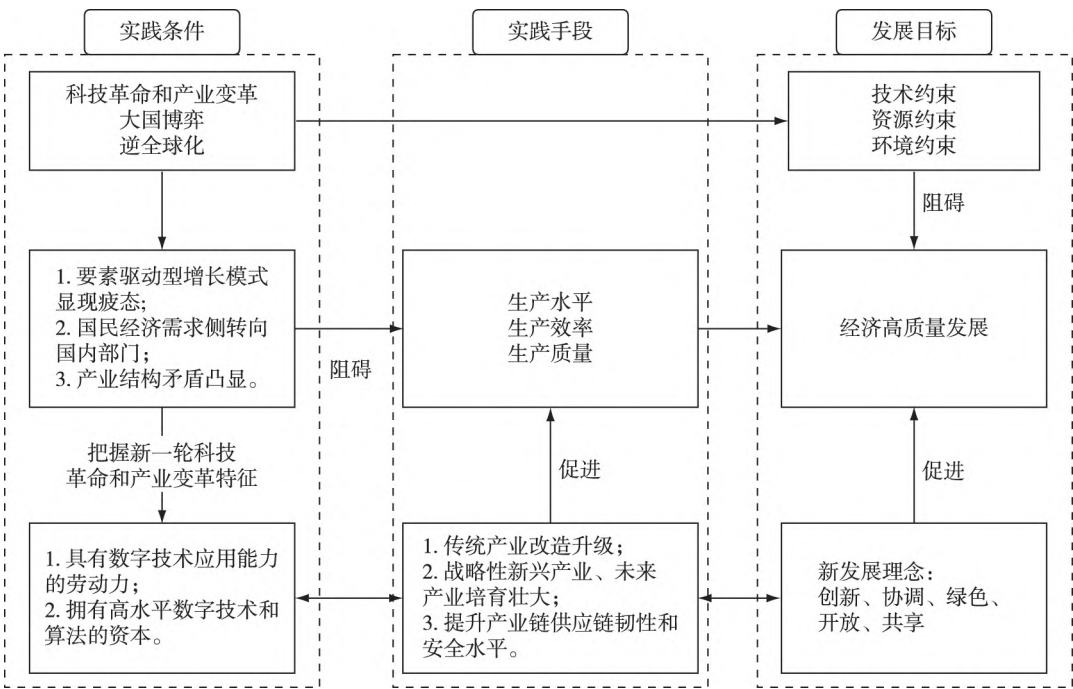


图 2 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规律

表 1 我国生产力的实践条件、发展布局与思想演变

发展阶段	实践条件	发展布局	发展思想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人力资本丰富,资金和技术资源匮乏,生产关系落后	实施“三化一改”政策,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目标	解放生产力,跳出“贫困陷阱”,突破重工业瓶颈
改革开放初期	产业结构不合理、微观经济效率低	在城市进行“放权让利”的体制变革,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外开放	实现小康社会目标,推进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进入新时代	要素驱动型的增长模式显现疲态,需求转向国内,产业结构矛盾突出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阱”扫除了障碍。我国制定了以重工业优先发展目标的赶超战略,辅以低利率、低汇率以及低工资等政策,为突破重工业发展瓶颈创造了制度基础和资源条件。^①从产业结构的变化来看,1952—1957年,我国的工业增加值占农业增加值的比例从41.2%增至73.8%,重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从35.5%提高到了45.0%,表明我国工业的落后状况已经得到大幅改善。从生产力的空间布局来看,为实现社会生产力的均衡配置,我国积极推动内陆地区的工业发展。到“一五”计划末期,内陆工业总产值的占比较期初提高约3

① 王曙光、王丹莉《维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论》,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4-5页。

个百分点。到“四五”计划期间,我国已在西南、西北、豫西、鄂西、湘西与晋南等地区成功建设一批新兴工业生产基地,均衡配置生产力的策略取得了显著成效。

改革开放初期,扭曲的产业结构和低下的微观经济效率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在产业结构方面,我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长期指导下,呈现农业、轻工业相对薄弱的短板,这导致投资品相对丰富,消费品相对短缺,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微观经济效率方面,计划经济造成我国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生产上缺乏改进效率和提高产品质量的动力,劳动激励不足。为了解决人民生活水平落后、生产效率低下的问题,我国将自由经济引入社会主义制度,在城市进行“放权让利”的体制变革,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外实行开放政策,发展目标是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以及小康社会。1978—2007 年,我国人均 GDP 实现了从 385 元到 20494 元的增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171 元增长至 8584 元,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了从 1559 亿元到 89210 亿元的快速增长,商品供应呈现多样化和高端化趋势,消费者需求从以基本生活品为主转变为以发展型、享受型消费品为主。

进入新时代,我国比较优势随着资源禀赋、要素禀赋和产业结构的变化而发生改变。首先,传统的要素驱动型增长模式显现疲态。具体表现为劳动力成本优势下降、资本使用效率降低、自然资源约束日趋严峻等。其次,在大国博弈愈演愈烈、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化向本土化和区域化转变的背景下,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经济需求转向国内。最后,产业结构矛盾凸显,呈现农业基础薄弱、工业产值被低端市场锁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等问题。为有效应对国内外复杂严峻形势和各类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创造性地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为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战略指引。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手段。据统计,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迅猛,2021 年的增加值达到 15.3 万亿元,占 GDP 的 13.4%。我国在新一代移动通信、核电、光伏、高铁、互联网应用、基因测序等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同时在以新能源发电、新能源汽车、智能手机等为代表的重产业领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二) 新时代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机制

科技革命是形成“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的主要原因,是人类生产力实现历史性跃迁的重要驱动力。^①工业革命以蒸汽机的发明与应用为重要标志,大机器生产弥补了工场手工劳动存在的效率低下、质量难以均一等缺点,大幅度提高了社会生产力。随着发电机和内燃机的普及,人类社会进入电器和钢铁时代,这标志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开始。到了 20 世纪后半叶,生物科技与电子信息技术变革引发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电子计算机、互联网的发明与应用实现了跨越物理距离的低成本知识共享和信息交互,社会劳动效率实现了质的飞跃。21 世纪,人类社会进入综合发展阶段。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认知

^① [英]克里斯·弗里曼、[英]卢克·苏特《产业创新经济学》,华宏勋、华宏慈等译,东方出版中心,2022 年,第 20—22 页。

科学(NBIC)等聚合科技快速发展,人类认知世界的方式从“分析”主导转向以经验和自觉为出发点的“综合”主导,形成了以“人类知识体系和认知能力融会贯通”“人类心智和人工智能协同进化”为主要特征的“大科学”综合系统。^①

当前,数据成为核心生产要素。它推动了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在各种领域和场景中的广泛应用,成为新一轮科技变革、产业革命的重要标志。当前我们所处的时代和我国的发展需求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呼唤新质生产力。在宏观层面,新时代的生产力实践更符合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在中观层面,产业体系现代化驱动生产力变革;在微观层面,要素协同提升微观经济效率。

1. 新时代生产力实践更符合新发展理念

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是新时代生产力实践的指导原则和行动纲领,从宏观层面确定了以创新为第一动力、协调为内生特点、绿色为普遍形态、开放为必由之路、共享为根本目的的生产力发展路向。^②其一,以科技创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到2035年,“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③其二,协调发展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增强发展的整体性协调性,推动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实现乡村与城市的融合互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呼应,推动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良性互动。其三,发展绿色生产力。“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推动传统高能耗高排放行业企业的绿色化转型,鼓励绿色技术创新,培育更符合绿色发展需求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其四,形成更具开放性与共享性的生产力实践。在未来五年,基本形成更高水平开放的经济新体制,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同时,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加快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文明成果和精神文明成果由全体人民共同享有。

2. 产业体系现代化驱动生产力变革

相较于传统产业体系,现代化产业体系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和安全可持续性等优点,通过产业体系的现代化建设可以驱动生产力变革。首先,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展由“数实”结合、绿色低碳和自主创新驱动的先进工业,进而实现以科技创新驱动生产力变革。其次,构建服务业新体系。生产性服务业是引领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重要力量,提升生产性服务业的规模和占比,有效发挥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协同创新效应,能够增强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进而提升产业体系的现代化水平。最后,推动农业现代化,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为载体、农业科技和装备为支撑,推进农业生产现代化、农业组织高效化、农产品与农业生产资料市场化发展,促进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

3. 要素协同提升微观经济效率

在微观层面,劳动力与资本的数字化、智能化是新质生产力区别于传统生产力的特征

① 蔡曙山《大科学时代的基础研究、核心技术和综合创新》,《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3年第9期。

② 陈健、张旭《新发展理念的政治经济学阐释》,《中州学刊》2023年第6期。

③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33页。

之一。具有数字技术应用能力的劳动力与拥有高水平数字技术和算法的资本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构成条件。^①从劳动替代理论来看,数字技术对重复性的、高危的、高精度度的工作具有更高的适应性。数字化资本在处理大量数据和进行复杂计算方面更胜一筹,能够部分代替人类劳动。以“黑灯工厂”为例,其主要由智能机器人或自动化设备组成,仅需要少数具备计算机技能的工人即可完成全环节的工作,不仅在生产效率、产出稳定性等方面实现大幅跃升,而且生产时间得到大幅延长,对于提高微观经济效率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从环境保护角度来看,数字技术也为企业提供了新的可能性。通过精准的数据分析和预测,企业可以更有效地管理资源,减少浪费,降低对环境的影响。技术驱动的资源优化管理模式不仅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也有助于实现生产力实践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四、形成路径: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总体布局

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结合“实践条件—实践手段—发展目标”生产力理论框架,对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路径布局如下。

(一) 利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思维协调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目标与实践过程

一方面,要用唯物史观把握新时代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目标。在制定发展目标时,不仅要考虑科技进步、人力资本水平等基础条件变化,还要考虑人口结构、资源储量、环境和气候变化等因素导致的约束条件改变。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过程中,应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生产力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另一方面,要运用辩证思维局部协调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目标与实践过程。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过程亦是传统生产力逐渐弱化乃至最终退出的过程,转变过程难免伴随阵痛。因此,需要分阶段稳步推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第一,协调新旧动能转换。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把握高质量发展与稳增长目标的辩证关系。第二,协调新旧产业更迭。在对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的研发、商业化应用和产业融合进行准确定位的基础上,坚持“创新优先”“适时淘汰”原则,提前规划布局,为新兴产业发展、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夕阳产业有序退出留足空间。第三,协调新旧设备更新。完善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鼓励生产企业通过“以旧换新”等模式更新、取代高污染、高能耗、低效率设备。

(二) 通过科技创新引领生产力变革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是以技术创新为基础,创造生产要素新组合、产业发展新模式和经济增长新动能。^②据此,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来布局、发展生产力是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首先,要充分发挥国家在创新过程中的组织和引导作用。坚持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鼓励高校、科研机构等深度参与基础科学研究。综合利用财政、金融手段支持创新过程中的容错机制,增加总体试错机会,鼓励更大胆、更广泛的探索和实验行为。其次,畅通“科技创新成果—新质生产力”转化通道。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和专利交易体系,确保科技创新成果得到充分保护,促进市场化推广与应用,尽快实现创新成果

① 刘志雄、谢建邦《数据流动与数据生态治理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Z1期。

② 李娅、侯建翔《现代化产业体系:从政策概念到理论建构》,《云南社会科学》2023年第5期。

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同时,实施知识产权使用的尽职调查机制,构建知识产权溯源系统,防止知识产权滥用,进一步强化知识产权管理和保护。最后,打造适宜创新的政策环境和营商环境。通过金融支持和政策引导推动社会资本参与创新投资,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推动产学研一体化发展。

(三) 利用要素协同、产业融合创造有利发展条件

当前,生产力实践目标与实践条件均发生巨大变化,需要通过要素协同和产业融合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一方面,要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融合,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大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大多为由内而外自主而发的数字一体化、专业化,而中小企业由于体量较小,仅凭其自身无法有效产生数字化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因此,中小企业主要以依附式的数字化转型为主。政府需要引导、鼓励传统经济和数字经济龙头企业联合打造数字生态圈,以降低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门槛。另一方面,需要推动不同产业的融合发展,形成更加专业化、细密化的分工格局。推广“链长引导、链主主导”的“链长制”产业分工合作模式,培育更具成本优势的生产性服务企业,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消除传统产业的产能惯性和路径依赖带来的负面影响,应对消费结构转型升级、消费需求向多样化和专精化转变的趋势。

五、结 语

当前,我国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而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能。准确解构新质生产力,把握其实践过程的外部动态性和内部互动性,可以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理论基础和经验证据。本文通过梳理生产力实践的理论逻辑,发现生产力的实践条件、实践手段和发展目标在形成新质生产力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据此提出“实践条件—实践手段—发展目标”生产力理论框架。新质生产力是在新发展格局下,通过科技创新和数据驱动的要害协同实现的生产力实践条件变革,它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引领,以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为目标,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从形成机制来看,新质生产力是新发展理念下产业体系现代化建设和要素协同的必然结果。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需要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思维协调宏观发展目标与生产力实践过程,通过科技创新引领生产力变革,利用要素协同、产业融合创造有利的发展条件。

(责任编辑: 来向红)

cyber violence behaviors. However ,caution must be exercised regarding the potential dangers of purpose interpretation , especially in cases where victims of cyber violence commit suicide. Upholding the principles of legality and maintaining legal stability ,it is prudent to refrain from categorizing such cases as intentional injury or homicide until specific legislation is enacted ,to avoid overreaction and infringement on citizens' freedoms.

Understanding and Enlighten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Based on the Thought of *Yi Jing*

DAI Xiang

The concep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proposed by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draws on the essence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 expands the theory of productivity in Marxism , and represents the integration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with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profound thoughts contained in the *Yi Jing* , such as “quantitative change leading to qualitative change” and “the interplay of rigidity and flexibility resulting in changes” , help us better understand the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proposed by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 the connection and distinction between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nd traditional productivity , and the engine rol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promoting high - 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profound thought of “following the timing of the world , and acting accordingly” contained in the *Yi Jing*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exploring strategies and measures to accelerate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heoretical Logic , Practical Rules , and Formation Path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the New Era

XIE Jianbang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serves as a novel driving force for high - 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 facilita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oductivity conditions throug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data - driven factor coordination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Guided by the innovation - 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oriented towards innovation , coordination , green , openness , and inclusiveness , the paper propose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practice conditions - practice means - development goals” for understanding productivity. By examining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logic and formation mechanisms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 the paper offers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empirical evidence for its formation path. To expedite the form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 it is essential to apply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t view and dialectical thinking to align macro development goals with productivity practice processes , drive productivity transformation throug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 and cultivate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formation through factor coordination and industrial integration.

Strategic Priorities and Jiangsu' s Role in Cultivat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GE Heping , WANG Jiahao , WU Fuxiang

Qualitatively new productivity represents a productive force essential for the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of industries. The realization of high - quality industrial development hinges on the driving force of qualitatively new productivity. There exists a mutually reinforc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qualitatively new productivity and high - quality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emerging industries” and “future industries” stand as two pivotal strategies for expediting the formation of qualitatively new productivity. While Jiangsu has made phased achievements in nurturing qualitatively new productivity , shortcomings such as insufficient planning and layout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deficiencies , and the need to enhance green development persist. Jiangsu can optimize and strengthen its qualitatively new productivity through three key approaches: promot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 driving reform and innovation , and constructing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 thereby realizing high - quality industrial development.